

《人民文学》多任主编齐聚热议,创作呼应抒写改革开放40年,需要有—— 把握时代的敏锐 书写时代的雄心



徐怀中 (程小玲摄)



王蒙



蒋子龙



刘心武 (除署名外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许 畅

王蒙、蒋子龙、刘心武、李敬泽、施战军……老牌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多任主编、编委难得同时出现,而他们相聚的理由,依然是文学。昨天“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揭晓,获得“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奖”的徐怀中、王蒙、蒋子龙、刘心武,可以说正是一路见证书写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代表作家。他们以各自代表作捕捉社会发展节点,成为当代原创力量中的醒目坐标。

恰如王蒙所说:“文学是人类的复活节日。复活,从而更加确认了也战胜了失去。文学的力量是使得没有对应办法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生成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动。”把握时代的敏锐、书写时代的雄心,对于今天的写作者依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40年来时代变迁,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书写

大到国家与民族面貌、小到人们日常生活,40年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也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契机与动力。文学收获与时代进程间的交织重合,印证着改革开放对我国文学事业的巨大推动。“有一点确凿无疑——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情感、作品,我们的文学生涯从根本上都是被改革开放所塑造影响的,许多文学作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说。比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首发于

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揭晓,80后笛安成最年轻得主 徐怀中王蒙蒋子龙刘心武获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奖

本报讯(记者许畅)作为国内备受瞩目的老牌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2018年发表了哪些不容错过的作品?昨晚,“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揭晓,分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非虚构、翻译奖、特殊文体奖等多个类别,80后作家笛安《景恒街》、李凤群《大野》获长篇小说奖,前者也是这届最年轻的获奖者。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人民文

学奖特设“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奖”,徐怀中、王蒙、蒋子龙、刘心武获特别贡献奖。

季宇《最后的电波》、林森《海面上》获中篇小说奖;薛舒《相遇》、裘山山《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摘得短篇小说奖;散文奖颁给了鱼禾《界限》、汪民安《绘画中的手》;诗歌奖由臧棣《我欠你一个伟大的哑巴入门》、张远伦《我有青菜虫般的一生》

获得;非虚构作品奖由欧阳黔森《报得三春晖》、李彦《何处不青山》摘得;蒋一谈《蒋一谈的童话》获特殊文体奖。

此外,海外影响力奖项颁给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的麦家。在以“中国文学,世界表达”为审美理念的《人民文学》外文版《路灯》上,麦家《两个富阳姑娘》《成长》《天外之音》《日本佬》等短篇小说,被译成英、意、西、韩文等。

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从此,新时期文学收获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关键词:“改革文学”。继以《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领军题材城市生活创作之后,蒋子龙深切改革时代乡镇巨变,从《燕赵悲歌》到《农民帝国》,接续反思传统文化的五四新文学精神,接活现实中国大地上的人事物理,在社会改革与文化人格的深水区,建构了内涵庞杂而思辨透辟的文学世界。

不止是蒋子龙,刘心武的创作也深度嵌入了时代烙印。从最早的《班主任》开启文学新思潮,到《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等人道情怀力作,再到《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开创“非虚构”写实小说范式,之后新

长篇《飘雪》探勘丰繁浩茫的新世情……40多年来,刘心武从发时代之先声到不断自我突破,走过一条创作长征。王蒙还记得,第一眼读完《班主任》的那种惊艳,“心跳和血压一下子陡然升高了”。刘心武回忆说:“1978年我36岁,现在我76岁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很难想象现在的我会身在何处。”

“在这一过程中,徐怀中、王蒙、刘心武、蒋子龙等作家开辟的文学道路,并不像现在看起来那么容易、那么理所当然,回顾过往40年是为了展望未来,中国文学在新时代应该怎么样、能怎么样?我们所驰骋的创作空间,也不是摆在那里等着我们,而是有待写作者去奋力探索,开辟出有巨大可能性的天地。”李

敬泽谈到,每一代作家都有每一代的机遇和限制,有的作者会变得故步自封、胆小不敢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前辈作家的弄潮儿精神和勇气,他们所迸发出的巨大想象力和创造力,依然是年轻一代作家要学习和继承的。

创作不能围着杯水风波打转,或懒于急于了解广阔世界

改革开放带来国外文学理论和艺术创新,拓宽了一代作家的视野,丰富了创作手段;另一方面,历史巨变将广大作家带到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新鲜生动、更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面对时代的丰饶馈赠,能不能捕捉具有时代特征

业内观点

■作家徐怀中:自从《西线无战事》以后,我在创作上多少有了一些觉醒。不是说你经历了哪个战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了。我是老一茬作者,下笔愈发慎重。挑战在于要把头脑中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抛开过往创作上的窠臼,完全回到文学自身规律上来。

■作家蒋子龙:有段时间,我锐气也钝了,有时偷懒不想写,一天就混过去了。但后有追兵、前有榜样,这种“两头夹攻”的感受,让我不敢松懈。写作,就是要抓自己的心跳,跟随生活和时代的召唤。

■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老一茬作家开辟的文学道路,并不像现在看起来那么容易、那么理所当然。回顾过往40年是为了展望未来,中国文学在新时代应该怎么样、能怎么样?我们所驰骋的创作空间,也不是摆在那里等着我们,而是有待写作者去奋力探索,开辟出有巨大可能性的天地。

■《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有时,创作者往往懒得去了解外部的广阔世界,只围着自己熟悉的一点点杯水风波去虚构想象,这样很难创作出传递时代情绪、引发读者共鸣的作品。

的细节,写出纵深感,是许多作家面临的挑战。回过头看,王蒙20岁写出《青春万岁》,21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处女作《小豆儿》,22岁发表成名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为影响当代文学史的事件。王蒙笔下的青春和成长,摆脱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激昂式肤浅化青春写作,而是饱含着生活和时代的复杂要素。

今年,老当益壮的90岁作家徐怀中,捧出了最新力作《春风记》,首发于新近出炉的今年第12期《人民文学》。他曾以里程碑般的《西线无战事》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以《底色》对非虚构创作作出突出贡献,作为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教育家,徐怀心中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记。而《春风记》又是一次新的镌刻。

王蒙明年会推出一篇5万字长篇小说,但他旋即感慨:“这也没啥骄傲的,你想徐怀心中90岁还写出了新长篇,我那自满的情绪被压得结结实实,九十高龄啊!我会以徐怀中之为榜样,继续收起尾巴,只要还活着,我希望也能写到90岁。”

而从今年人民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不难发现,不少作家也从既有的写作题材和范式中跳出,拓展出的新气象。年度最年轻的获奖者、80后作家笛安,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景恒街》,从她此前的青春文学书写上有所剥离,距当下都市更近,在创业、融资、商战故事里融入生动情节,世故里含纯真,功利中有体恤,既有贴切的城市生活气息与质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悯情怀,不动声色之间可窥时代运行轨迹、社会转型风貌与情感结构变迁。

今年话剧舞台上经典名作表现抢眼,其中孟京辉版《茶馆》 抛弃源文本,大胆创新,引起业界关注——

经典重排,是“致敬”“颠覆”还是“再生”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李六乙执导了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王晓鹰尝试了中希双语版《赵氏孤儿》,赖声川改编了曹禺《北京人》,赵立新自导自演了斯特林堡的《父亲》……今年,国内一批知名导演纷纷走上改编创作的道路,他们所挑战的对象,并非只是单纯躺在纸面上的文学作品,而是在舞台上留下过辉煌历史的戏剧经典。其中,尤以亮相十月乌镇戏剧节、由孟京辉和德国戏剧制作师共同改编的《茶馆》最具话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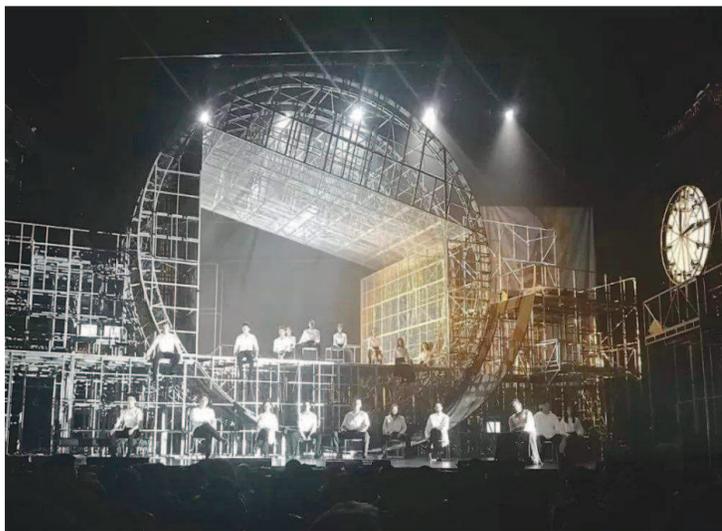
围绕这部“另类”《茶馆》,议论纷纷,有着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赞许的声音认为,孟京辉的改编释放了《茶馆》时空的局限,与整个世界版图、与所有时代接轨。批评者则认为,老舍的《茶馆》在整体性上被破坏了。“孟京辉可以将这出戏以任何名称命名,但这不应该用老舍的《茶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胡志毅表示,“六经注我”的创作态度,使导演几乎抛弃了源文本的使用;这样“面目全非”的改编作品或许能吸引到一些年轻观众“进场”,但也容易误导他们对于经典的理解。

林兆华曾经说,希望有人能排出“第二版”《茶馆》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说,“经典作品永不会耗尽他要对读者说的一切东西”。正因为经典的开放性,各个时代的阐述者总能在其中找到新的意义,《茶馆》《哈姆雷特》《赵氏孤儿》《等待戈多》等反复在全球舞台上演再演就是范例。

必须承认,“非属一代独有,实为千秋共宝”的经典,是导演在剧本荒的创作空隙中可以寻求的启示。但另一方面,经典又是戏剧创作历史上,对剧作家、导演、演员等舞台创作者构成最大压力、最大焦虑的来源。

《茶馆》是文学大家老舍的杰作、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在话剧舞台上,这个经典最初是由焦菊隐、夏淳两位导演和北京人民艺术



在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孟京辉的改编完全脱离了传统《茶馆》的影子,其舞台呈现出强烈的后戏剧剧场的风格。(乌镇戏剧节供图)

剧院的老艺术家们在1958年缔造的。这版以地道京味、纯熟表演见长的《茶馆》,多年来在观众心目中地位卓越,历经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1999年,林兆华怀着满腔热情想要创造出“第二版”《茶馆》却无疾而终,2005年他担任复排艺术指导,重新恢复了焦菊隐版《茶馆》。

“这个戏是艺术的招牌。我想创新,但没有能力去驾驭得更好。”当时,林兆华这样回应的。“不过我始终认为,戏剧永远是发展的,总是拿过去的《茶馆》说事,不怎么样。我失败了,不等于不可以有后来者。我希望后来者可以超越我,排出不一样的、同样经典的《茶馆》。”

在经典基础上的创新,激励了一批又一批创作者。2017年,导演李六乙携手四川人

民艺术剧院打造了一部川味版《茶馆》,打破了《茶馆》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长期“垄断”的局面。他的《茶馆》巧妙嫁接了四川文化,以语言属性和地方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而在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孟京辉的改编完全脱离了传统《茶馆》的影子。他邀请“外援”德国戏剧制作师塞巴斯蒂安·凯撒一同加入创作,舞台呈现出强烈的后戏剧剧场的风格。一个堪称巨型的“摩天轮”装置几乎完全夺去了观众的注意力,身着白衣黑裤的演员们,用沙哑到接近嘶吼的嗓音,串联了《茶馆》第一幕的台词……该剧一开场,工业感极强的舞台风格和大量抽象的符号,就完全颠覆了传统《茶馆》的写实主义印象。孟京辉说他在小说原作的基础上,糅进了老舍其他作品元素,甚至有布莱希特、莎士比亚等先贤作品的影

子,可谓“注脚”繁杂。

面对经典,“自视甚高”与“过度自卑”均不可取

不可否认,戏剧领域“经典再生产”的过程中,导演往往担任了比剧作家更重要的职责。

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先锋戏剧的领军人物之一,孟京辉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游戏化解构的倾向。戏剧研究者、厦门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霍旭认为,孟京辉所解构的对象往往不直接指向源文本,而是借用源文本激发新意,他的经典再生更多的是游戏化和狂欢化。在此情况下,经典源文本很容易在游戏的姿态中丢掉了所谓的“光晕”。

孟京辉的戏剧往往以一种精确推敲过的不确定性在经典与大众之间、在先锋与商业之间游走。这部《茶馆》的结尾,就高度体现了孟氏戏剧游戏化的特征。文章扮演的王利发、韩青扮演的秦二爷、陈明昊扮演的常四爷不是用对白,而是念白,撒钱纸,伴随着铁轮转动的茶桌、椅子、账单、菜谱反复颠倒、翻转,在电子音乐和疯狂的舞蹈中,完全解构戏剧结尾。

把《茶馆》的对话和情节当作素材,然后任由导演处置、安排,或放大,或变形,或夸张。于是,原来的人物和情境变得断断续续,插入大量的非《茶馆》的内容,使得原著本身碎片化、小品化了。“这种改编方法,恐怕只有没看过《茶馆》的人才会完全接受。”胡志毅说。经典的再生产过程中,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经典再生在与经典原著的对视中,容易产生一种低层次的认知,束缚在对经典的仰视之中,创造性被完全遏制。但与“过度自卑”一样,“自视甚高”也同样不可取。霍旭认为,在对经典认识不深刻的情况下贸然对其颠覆改造,生成自我,容易带来价值建构和美学建构的失语,“经典改编,究竟是追求颠覆经典的快感,还是共情经典所蕴含的生命感?恐怕是改编创作者首先要面对的自我叩问。”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临近年末,位于黄浦区牛庄路704号的中国大戏院即将迎来一个全新演出季,让好戏“全年无休”。12月21日至28日,中国大戏院携手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古希腊“喜剧之王”阿里斯托芬经典喜剧《鸟》以及莎士比亚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

作为黄浦区“演艺大世界——人民广场剧场群”的重要地标之一,88岁的中国大戏院历史悠久,曾经是上海京剧“四大舞台”之一,积淀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艺术和城市记忆。今年5月,中国大戏院历经六年改造“重装归来”,为期四个多月的开幕演出季暨国际戏剧邀请展以高质量的作品征服了无数观众。其舞台上呈现的艺术气息更为时尚、开放、多元,成功“圈粉”了不少年轻的剧场观众。

虽为改编,但全新演出季的两部作品却突出古老作品的年轻气质。首先上演的《仲夏夜之梦》是莎士比亚最常被搬演改编也是最受喜爱的喜剧之一,极具浪漫性和抒情性。作为国家大剧院首度制作的莎翁经典话剧,《仲夏夜之梦》着力对莎士比亚原著文本进行深度梳理,回归经典的同时与时代语境相呼应。

国家大剧院特别邀请到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合作导演克里斯·怀特打造了此版《仲夏夜之梦》。演出并没有刻意追求陌生化或本土化,除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几乎完全依据朱生豪先生翻译的剧本进行创作,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原汁原味。不过,舞美上的“变化”却无所不在,呈现出丰富感和灵动性。舞台上的70根“木棍”,符号化地呈现出空间的流动性,既为表演提供了更多可能,也为观众的想象提供了更多留白。

而另一部作品《鸟》则是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之一,首演于公元前414年,带有强烈的神话寓言色彩。此次中文版话剧邀请戏剧教育家罗锦鳞与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罗彤担任导演,是国家大剧院首次排演的古希腊戏剧作品。喜剧《鸟》在创作过程中秉承希腊戏剧简约的风格特色,并融入很多现代、时尚、贴近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元素,充满了趣味性。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剧情,罗彤导演将《鸟》原剧本进行了重新编译,与此同时,以“剪纸”为主体的舞美、充满情感和仪式感的歌队,也让整部作品的舞台表达更为生动、活泼。

「重装上阵」的中国大戏院年未好戏不停—— 《鸟》《仲夏夜之梦》凸显古老戏剧的年轻气质